

中国知网（CNKI）来源集刊

复旦大学“学术期刊质量提升支持计划”资助立项

Journal of China's
Neighboring Diplomacy
Volume 5, Issue 1 (2019)

中国周边外交研究

第九辑

复旦大学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研究中心 编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周边外交研究. 第9辑 / 复旦大学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研究中心编.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9.12

ISBN 978-7-5012-6148-2

I. ①中… II. ①复… III. ①中外关系—研究

IV. ①D82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20) 第201609号

责任编辑
责任出版
责任校对

狄安略
赵 玥
张 琨

书 名
主 编

中国周边外交研究·第九辑
Journal of China's Neighboring Diplomacy: Volume 5, Issue 1 (2019)
复旦大学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研究中心

出版发行
地址邮编
网 址
电 话
经 销
印 刷
开本印张
字 数
版次印次
标准书号
定 价

世界知识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51号 (100010)
www.ishizhi.cn
010-65265923 (发行) 010-85119023 (邮购)
新华书店
北京虎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710毫米 × 1000毫米 1/16 19%印张
344千字
2020年10月第一版 2020年10月第一次印刷
ISBN 978-7-5012-6148-2
9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为适应我国信息化建设，扩大本集刊及作者知识信息交流渠道，本集刊已被中国知网（CNKI）系列数据库收录，其作者文章著作使用费与本集刊稿酬一次性给付。免费提供作者文章著作引用统计分析资料。如作者不同意文章被收录，请在来稿时向本集刊声明，本集刊将做适当处理。

《中国周边外交研究》半年刊

主管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

主办 复旦大学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研究中心

主编 石源华

副主编 包霞琴 祁怀高

编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左希迎 中国人民大学

石源华 复旦大学

卢光盛 云南大学

归泳涛 北京大学

包霞琴 复旦大学

关培凤 武汉大学

祁怀高 复旦大学

李皖南 暨南大学

杨健 复旦大学

吴心伯 复旦大学

[日本] 青山瑠妙 日本早稻田大学 (Waseda University)

赵卫华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赵可金 清华大学

钟飞腾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

费晟 中山大学

薛松 复旦大学

魏玲 外交学院

[马来西亚] Datuk Danny Wong Tze Ken

马来亚大学 (University of Malaya)

编辑部 胡旻昱 张泽宇

编辑部联系方式

投稿邮箱: ccmc@fudan.edu.cn

电话: 86 21-6564 2939

传真: 86 21-6564 2939

地址: 上海市邯郸路220号复旦大学文科楼307室复旦大学中国与
周边国家关系研究中心

邮编: 200433

目录

CONTENTS

卷首语.....	石源华 /	1
----------	-------	---

中国周边外交七十年专栏

周边外交视阈下的中国 70 年对美外交.....	潘亚玲 /	11
中国对日外交 70 年述论.....	吴寄南 /	31
中国对印外交的历史、现状和未来.....	关培凤 /	52
中国对中亚区域外交的历史演进和未来发展.....	张 宁 /	74
中国西亚区域外交：历程、成就与未来抉择.....	郭 锐 /	94
中国对南太平洋区域外交 70 年述论.....	费 晟 /	113

中国周边外交综论

关于中国周边问题的思考.....	张蕴岭 /	137
改革开放 40 年中国周边外交的理念与实践.....	李 文 刘铭贻 /	142
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与中国周边学.....	夏立平 钟 琦 /	159

中国周边学笔谈（三）：青年专场

反思与建构：中国周边学中层理论探索.....	蒋建忠 /	177
浅议中国周边学的价值取向.....	薛 松 /	182
中国周边学与东西方外交理论的比较与融合.....	曹 玮 /	187
“中国周边学”的三种解读和创设目标.....	张 群 /	192

中国周边学的新课题：如何为区域提供规范.....	贺嘉洁 / 197
学习者视阈下的中国周边学“十问”.....	张 励 / 201

中国周边专题研究

中国周边经济形势的评估和分析.....	钟飞腾 / 211
“一带一路”与中国国家形象的内外构塑.....	马丽蓉 / 238
论新时代海防观的理论来源、内涵及思维方法.....	高新生 / 248

新书栏

中国周边学的提出、推介和研究 ——《中国周边学研究文集》前言.....	石源华 / 269
--	-----------

会议综述

第八届中国周边外交研讨会综述.....	胡旻昱 / 283
---------------------	-----------

附 录

复旦大学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研究中心简介.....	/ 295
《中国周边外交研究》征稿启事.....	/ 297
《中国周边外交研究》稿件体例及注释规范.....	/ 299

Contents

Preface.....*Shi Yuanhua* / 1

China’s Neighboring Diplomacy in the Past 70 Years

China’s Diplomacy toward the U.S. in the Past 70 Years: A Review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na’s Diplomacy with Its Neighboring
Countries *Pan Yaling* / 11

A Review of 70 Years of China’s Diplomacy toward Japan *Wu Jinan* / 31

The History, Reality, and Future of China’s Diplomacy toward India
..... *Guan Peifeng* / 52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and Future Development of China’s
Diplomacy with the Region of Central Asia *Zhang Ning* / 74

China’s Diplomacy with the Region of West Asia: Process,
Achievements, and Options for Future..... *Guo Rui* / 94

A Review on China’s Diplomacy with the Region of South Pacific in
the Past 70 Years..... *Fei Sheng* / 113

Comprehensive Studies on China’s Neighboring Diplomacy

On Solving China’s Neighboring Issues *Zhang Yunling* / 137

Conception and Practice of China’s Neighboring Diplomacy in the
Past 40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up *Li Wen and Liu Mingze* / 142

Constructing a New Typ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China’s
Neighboring Countries Studies *Xia Liping and Zhong Qi* / 159

China's Neighboring Countries Studies Report, Part 3: Young Academics

Reflection and Construction: Exploring Middle-range Theory in China's Neighboring Countries Studies	<i>Jiang Jianzhong</i> / 177
Discussion on the Value Orientation of China's Neighboring Countries Studies	<i>Xue Song</i> / 182
Comparison and Integration of China's Neighboring Countries Studies and Diplomatic Theories of East and West	<i>Cao Wei</i> / 187
Three Interpretations on China's Neighboring Countries Studies and Its Targets	<i>Zhang Qun</i> / 192
New Subject of China's Neighboring Countries Studies: How to Provide Paradigm for the Region?	<i>He Jiajie</i> / 197
10 Questions about China's Neighboring Countries Stud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 Learner	<i>Zhang Li</i> / 201

Research Topics on China's Neighboring Diplomacy

Assessment and Analysis on the Economic Situation in China's Neighboring Countries	<i>Zhong Feiteng</i> / 211
BRI and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Construction of China's Image	<i>Ma Lirong</i> / 238
On the Origin of Theory, Contents and Thinking Methods of Coastal Defense in the New Era.....	<i>Gao Xinsheng</i> / 248

Reading Recommendation

Preface of Essays on China's Neighboring Countries Studies: Proposing, Presenting and Studying China's Neighboring Countries Studies	<i>Shi Yuanhua</i> / 269
--	--------------------------

Reviews on Symposiums

A Review on the 8th Symposium of “China’s Neighboring
Diplomacy”*Hu Yangyu* / 283

Appendix

Introduction on Center for China’s Relations with Neighboring
Countries of Fudan University (CCRNC-Fudan)..... / 295

Notice Inviting Contributions to the Journal of China’s Neighboring
Diplomacy / 297

Standards of Articles and Annotations of the Journal of China’s
Neighboring Diplomacy / 299

中国对日外交70年述论

吴寄南

【内容提要】日本是与中国隔着东海、一衣带水的邻国，是亚洲最大的发达国家，也是中国最重要的周边国家之一。中国的周边外交始终将如何处理好与日本的双边关系摆在最重要的位置。1972年，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揭开了双边关系上新的一页。近47年来，两国间的交流交往无论在广度上还是深度上都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两国从和平相处、平等合作中都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好处。随着国际环境的变化和两国综合国力对比的逆转，中日关系的发展跌宕起伏，充满着坎坷和曲折。就中国而言，在处理对日外交时如何趋利避害，顺势而为，确保两国关系沿着健康、稳定的轨道发展，是最棘手也是最重要的课题之一。

【关键词】中国 对日外交 70年

【作者简介】吴寄南，上海市日本研究会会长，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咨询委员会副主任、研究员。

日本是与中国隔着东海、一衣带水的邻国，是亚洲最大的发达国家，也是中国最重要的周边国家之一。中国的周边外交始终将如何处理好与日本的双边关系摆在最重要的位置。随着国际环境的变化和两国综合国力对比的逆转，中日关系的发展跌宕起伏，充满着坎坷和曲折。就中国而言，如何趋利避害，顺势而为，确保两国关系沿着健康、稳定的轨道发展，是最重要的外交课题之一。

一、中国对日外交的沿革与评估

新中国成立后，中日关系大致可以分为两大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49年到1971年。由于日本当权者追随美国，执行敌视中国的政策，民间外交成为两国交往的主要形式；第二阶段，从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至今。中日关系在各个领域都取得重大进展，但由于内外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风波迭起，呈时冷时热、错综复杂的局面。

（一）中日邦交正常化前的中国对日民间外交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时，日本尚处于美国军事占领之下，直到1951年4月“旧金山和约”生效才恢复独立。时任首相的吉田茂内阁一度曾考虑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但在美国的压力下，最终选择了与台湾蒋介石集团缔结所谓的“日华条约”。

中国政府强烈谴责日本当局同蒋介石集团建立官方关系。尽管如此，中方仍非常重视加强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

1952年5月，日本三位国会议员取道莫斯科访问北京，受到中国政府热烈欢迎。这是两国在尚未恢复邦交的情况下以民间形式开展交往的开始。两国的有识之士为增进两国的理解和往来做出了不懈的努力。1952年6月，中日间签署《中日贸易协议》，以民间贸易方式互通有无。1953年10月、1955年4月和1958年3月，双方签署3个民间贸易协定。1958年12月，签署为期5年的《中日钢铁贸易协定》。1962年11月，在周恩来总理和日本著名政治家松村谦三会谈的基础上，开始了以中国国务院外办副主任廖承志和日本前通产大臣高崎达之助两人姓氏命名的“L（廖）T（高）备忘录贸易”。从1964年起，两国互派代表，设立联络事务所，并互派常驻记者。

在岸信介内阁和佐藤荣作内阁任内，日本政府追随美国，推行敌视新中国的政策，中日民间交往一度遭受重挫。但是，随着中国国际影响的不断扩大，日本当权者无视新中国存在的“鸵鸟”政策已难以为继。1971年10月，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日本国内要求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呼声越来越高。1971年10月2日，中方提出“复交三原则”：1.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2. 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3. “日

台条约”是非法的，无效的，应予废除。^①

1972年7月，田中角荣出任首相，表示能够充分理解中方提出的“复交三原则”，愿为实现邦交正常化进行政府间谈判。9月25日，田中率团访华。经过五天会谈，中日双方于9月29日签署了《联合声明》。其中载明：“自本声明公布之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之间迄今为止的不正常状态宣告结束”，“日本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国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并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中国在《联合声明》中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的战争赔款要求”。^② 随同田中首相访华的大平正芳外相在《联合声明》签署后的记者招待会上宣布，由于中日邦交正常化的结果，“日华条约”失去存在的意义，已告终结，日本与台湾的“外交关系”无法继续维持下去。^③

（二）中日邦交正常化后的对日外交

中日邦交正常化揭开了中日关系史新的篇章。亚洲这两个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迥异、对地区局势有着举足轻重影响的国家开始摸索一条相互尊重、长期友好、互利合作的道路。随着国际环境的变化和两国综合国力对比的逆转，1972年后的中日关系大体经历了三个时期：

1. 成长期

20世纪70—80年代。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两国先后缔结了贸易协定（1974年1月）、航空协定（1974年4月）等双边协定。1978年8月问世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得到两国最高立法机构批准，奠定了中日两国长期和平友好、合作共赢的法律基础。

这一时期，中日关系的主旋律是全面开展交流与合作。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两国双边贸易迅速扩大。1972年，两国贸易额不到11亿美元；1981年突破了100亿美元大关；经过再一个10年的努力，1991年跃过202亿美元。1978年底，中国开始改革开放后，来自日本的资金、技术援助发挥了重大的作用。日本政府开发援助（Official Development Aid, ODA）始于1979年12月。其中

^① 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1971—1995）》，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39页。

^② 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1971—1995）》，第111页。

^③ [日]霞山会编：《日中关系基本资料集（1945—1997）》，1998年，第164页。

包括日元贷款、无偿援助和技术合作三项内容。1979年至1984年，日本对华第一次日元贷款的总额为3309亿日元；1984年至1990年，第二次日元贷款的总额为4700亿日元。日元贷款的利息较低（2.5%至3%），偿还期长达30年，对推动中国沿海地区和内地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环保项目发挥了重要的作用。^①

在双边关系日趋紧密和务实的过程中，两国间也出现过一些摩擦和对立。例如，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经济调整，取消部分成套设备进口合同，在日本国内曾引起一阵风波；1982年6月，日本文部省在审定教科书时将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改成“进出”，遭到中方强烈反对；1985年8月，中曾根康弘首相率领阁僚正式参拜供奉着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但是，由于中国政府采取坚持原则，顾全大局的立场，这些摩擦和对立没有影响中日关系的发展。

2. 磨合期

冷战结束后的20世纪90年代。中日两国随着交流交往的不断深化，彼此间龃龉与对立日渐凸显。再加上外部环境的影响，中日关系呈现出“V”状的跌宕起伏。

1989年夏秋之交，中国国内出现政治动乱。日本虽参加西方国家对中国的经济制裁，但与欧美保持了一定的距离。1990年7月，海部俊树内阁在西方发达国家中率先解除对华经济制裁。1992年10月，天皇和皇后访问了中国的西安、北京和上海，受到中国政府和民众的热烈欢迎，中日关系出现了一个小高潮。

进入90年代后，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入、投资环境持续完善，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出现迅速增加的局面。截至2000年底，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累计有20340项，合同总金额为386.34亿美元，成为中国最大的外资来源国。受对华直接投资的牵动，中日双边贸易额在1991年跨过200亿美元大关后，每年递增100亿美元，2000年中日双边贸易总额达831.7亿美元。^②中日两国在20世纪90年代缔结了两项为期5年的日元贷款协议。其中，1990年至1995年的第三次日元贷款，总额为8100亿日元；第四次日元贷款分两期执行，1996年至1998年为5800亿日元，1999年至2000年为3900亿日元。^③

① 吴寄南、陈鸿斌：《中日关系“瓶颈”论》，北京：时事出版社，2004年，第263页。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政策研究室编：《中国外交》，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第50页。

③ 吴寄南、陈鸿斌：《中日关系“瓶颈”论》，第263页。

但是，1994年至1996年，中日两国在政治和安全领域出现了较多的对立和摩擦。1994年9月，日本政府不顾中方的一再交涉，邀请台湾“行政院副院长”徐立德出席在广岛举行的亚运会，制造了“两个中国”的恶劣先例；1995年8月，日方借口中国进行核试验，无理冻结对华无偿资金援助；1996年7月，日本右翼团体登陆钓鱼岛建灯塔，构成对中国主权的严重挑衅；同月，桥本龙太郎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极大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

1997年以后，国际环境出现了有利于中日关系转圜的变化。其一是中美首脑互访成功，标志着冷战结束后一度很不稳定的中美关系逐步走上正常轨道。其二是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促使这一地区的国家抱团取暖，共度时艰。1997年9月，桥本首相访华，宣布日本将遵循村山前内阁在历史问题上的表态，绝不走军国主义道路或军事大国道路。1998年11月，江泽民主席应邀访问日本。这是中国国家元首历史上第一次访问日本。访日期间，江泽民主席与小渊惠三首相发表《联合宣言》，宣布将面向21世纪，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伙伴关系。中日两国为跨世纪的双边关系明确定位，标志着两国关系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3. 转型期

进入新世纪以后，随着国际环境的变化以及中日综合国力对比逆转，两国进入了竞争与合作并存，战略博弈加剧的新时期。中日关系呈“低—高一低—高”的态势。

进入新世纪后，国际格局日趋多极化，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改变了迄今为止的权力结构。其中，中国综合国力的上升更是引起全球的瞩目。中国的GDP在2010年反超日本，后又不断拉大与日本的差距，日本朝野对中国产生强烈的焦虑感，少数政治家产生要与中国“搏一搏”的冲动，试图迟滞甚至逆转中国的增长势头。

中日关系在这一时期出现两次低潮、两次高潮。第一次低潮是2001年至2006年，时任首相小泉纯一郎持续参拜靖国神社，引起中方的强烈愤慨。双边关系急趋恶化。

2006年9月，安倍晋三出任日本首相后，迫于国内外压力日益加大，寻求中日关系的转圜。2006年10月，安倍成为6年来第一个访问中国的日本首相，也是第一位将中国作为入主首相官邸后首次出访国家的日本首相。中日两国达成了致力于建立战略互惠关系的共识。2007年至2010年内，中日首脑互访频繁。特别是胡锦涛主席在2008年5月访日，与日本首相福田康夫签署了《中日

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成为奠定中日关系政治基础的第四个政治文件。

中日关系的“小阳春”很快由于2010年9月钓鱼岛撞船事件和2012年9月钓鱼岛“购岛风波”受到严重挫折。2012年12月，安倍再次出任首相后，中日关系出现了第二次低潮。两国在历史认识、台湾问题、领土争端乃至安全保障问题等几乎所有领域都尖锐对立、全面对峙。在小泉任内的第一次低潮中，两国经贸往来并没有受太大影响，呈现“政冷经热”的局面，但安倍复出后的第二次低潮中，中日经贸合作出现持续5年的萎缩，从2011年的3428.9亿美元跌至2016年的2747.9亿美元。与此同时，两国国民感情明显恶化。日本内阁府的外交舆论调查表明，日本受访者对中国有亲近感的比例从2011年度的26.3%跌至2014年、2015年的14.8%，没有亲近感的比例却从71.4%增为83.1%和83.2%。^①这不能不引起两国的严重忧虑。

2017年1月，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后，秉持“美国优先”的方针，推行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引起日本当权者的疑虑和不安。加上日本将在2020年举办东京奥运会，不希望由于同邻国交恶而给这次体育盛会带来负面影响。日本财界看到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取得显著进展，不希望由于中日关系继续僵冷失去难得的商机。在这种情况下，安倍于2017年5月派遣高官出席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向中方传递了希望改善中日关系的信号。

2018年5月8日至11日，李克强总理借出席中日韩领导人峰会之际对日本进行了正式访问。这是时隔8年中国总理再次访问日本；同年10月25日至27日，安倍晋三应邀访华，作为日本首相也是时隔7年后的第一次。这标志着中日关系终于走出持续多年的阴霾，重回正常轨道。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成功地与日本这个原本与中国处于交战状态的敌对国家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在世界上树立了一个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典范。在中日两国悠久的交往历史上，彼此第一次以平等地位相处，睦邻友好，互利合作。

中日两国作为世界第二、第三大经济体，经贸合作的规模和深度不仅在亚洲雄踞榜首，在世界上也是名列前茅的。2018年，中日双边贸易总额达3276.6

^① [日]内阁府：《外交舆论调查》，参见内阁府网站：<http://survey.gov-online.go.jp/index-gai.html>，访问时间：2019年1月19日。

亿美元。全世界达到这一规模的除中日外仅有美加、美中及美墨这三对贸易伙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也遥遥领先域外各国。截至2017年底，日本累计对华投资额1081.8亿美元。从1979年至2008年，日本政府向中国提供的日元贷款共255项，累计金额为33164.86亿日元。两国的人员往来也呈逐年扩大的趋势。从1972年的不到1万人到2018年的超过1100万人次，无论从广度还是从深度来看都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

二、中国处理对日外交的基本理念和创新思维

新中国的成立开创了中国对外关系的新纪元，也根本改变了旧中国与日本的关系。冷战结束后，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在处理涉日关系时主动营塑、积极引领的特征越来越明显。

（一）中国对日外交的基本理念

中国处理对日外交的基本理念在大的方面和处理与其他国家关系是一致的。但考虑到中日间历史的恩怨比较多，加上两国传统文化中多少有些相似的地方，中国对日外交的基本理念有一些独特之处。

1. 两分法

日本在历史上曾长期侵略中国，欠下了深重血债，已成为中华民族集体记忆中不可磨灭的一部分。两国交往中一不小心就会触碰到这一“痛点”。新中国领导人一贯坚持两分法，教育民众将发动战争的军国主义分子和同样也是战争受害者的日本人民区别开来。周恩来总理曾经这样指示：“要向群众多做宣传工作，要向人民讲清楚，中日两国人民都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受害者，对此日本人民是没有责任的。毛主席早就说过了嘛，要把帝国主义的政府和这些国家的人民区别开来。日本人民是愿意和中国人民友好的……两国应该在新的基础上重新友好！”^①

两分法的内涵在对日外交实践中不断延伸和充实，不仅适用战前的日本，也提供了战后如何区分日本政府和日本人民，区分日本政府内的主流派和非主流派，成为处理中日间复杂问题，做出一系列重要判断的依据。日本著名的中

^① 邓加荣、韩小蕙：《南汉宸传》，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93年，第385页。

国问题专家毛里和子将两分法誉为中国对日战略的两大支柱之一。^① 在日华人学者朱建荣肯定两分法是中国外交的一大亮点，是一笔财富。它体现了一种大国风范、宽广胸怀、仁义之心和迈向未来的精神，是一种始终站在正义一边的自尊、以不变应万变的自信和以东方文明的哲学文化道义为基础的软实力。^②

2. 和为贵

毛泽东和周恩来曾多次明确指出，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股逆流。1955年10月，毛泽东会见日本国会议员访华团说，“中日关系的历史是很长的，人类几十万年以来过着和平的生活，我们的祖先吵过架，打过仗，这一套可以忘记啦！应该忘记，因为那是不愉快的事情，记在我们脑子里干什么呢？”^③

周恩来也指出，近代以来，日本多次侵略中国，“中日关系是不好的，但这已经过去。我们应该让它过去。历史不要再重演。”“我们不能受外来的挑拨，彼此间不应该不和睦。我们要从我们自己中间找到真正‘共存共荣’的和平种子。”中日关系的“关键就是要和平共处，谁也不要存别的心思”，“我们要在友谊的基础上改善中日关系，……我们为的是和平共处。这就是我们友好的种子。”^④

邓小平则强调，要“把中日关系放在长远的角度来考虑，来发展。第一步放到21世纪，还要发展到22世纪、23世纪，要永远友好下去。这件事超过了我们之间一切问题的重要性。看得远些广些，有利于我们之间的合作、这种合作不是只对一方有利，而是对双方、对两国、对两国人民都有利”。^⑤

3. 求同存异

中日两国作为两个社会制度、意识形态迥然不同的国家，两国间又有过一段不幸的历史，加上所处国际战略环境和国家利益的差异，难免会产生这样那样的问题。中国领导人采取的方针是“求同存异”，顾全大局。

① [日]毛里和子：《重建中日关系》，《日本学刊》2013年第5期，第25页。

② 朱建荣：《对日“两分法”过时了吗？》，《日本学刊》2014年第4期，第41页。

③ 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年表（1945—1970）》，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231页。

④ 《周恩来总理会见日本国会议员访华团和日本文化代表团时的谈话》，1954年10月1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研究室，1990年，第87—88页。

⑤ 《邓小平会见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时的谈话》，1984年3月25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53页。

求同存异最早是周恩来在1955年万隆会议上提出来的。这次会议是由曾经遭受帝国主义侵略和奴役的亚洲、非洲国家发起和参加的第一个大型国际性会议。周恩来在会上严正宣布：“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我们共产党人从不讳言我们相信共产主义和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是好的。但是，在这个会议上用不着来宣传个人的思想意识和各国的政治制度。虽然这种不同在我们中间显然是存在的。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① 在中国的积极推进下，万隆会议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写进了《万隆宣言》，成为推动亚非国家团结反帝的指导方针。

在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中，中日两国领导人秉持求同存异的精神，就涉及两国关系政治基础的重大问题达成了一致。其中包括两国间存在主权争端的钓鱼岛问题。1972年9月27日，在中日第三次首脑会谈快要结束时，田中首相提出了钓鱼岛问题，周恩来总理明确表示这次不想谈。田中也同意，不需要再谈，以后再说。周总理也说，以后再说，这次我们把能解决的基本问题，比如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先解决。这是最迫切的问题。有的问题要等到时间转移后来谈。田中说，一旦邦交正常化，我相信其他问题是能够解决的。^②

1978年10月25日，邓小平赴东京出席《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换文仪式后举行记者招待会。针对岛屿争端问题，邓小平指出：“‘尖阁列岛’，我们叫钓鱼岛，这个名字我们叫法不同，双方有着不同的看法。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时，我们双方约定不涉及这个问题。这次谈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时候，双方也约定不涉及这个问题。倒是有些人想在这个问题上挑一些刺，来障碍中日关系的发展。我们认为两国政府避开这个问题是明智的。这样的问题放一下不要紧，等十年也没有关系。我们这一代人缺少智慧，谈这个问题达不成一致意见。下一代人肯定比我们聪明，一定会找到彼此都能接受的方法。”^③

以后，邓小平曾经不止一次地强调这一立场，并进一步提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主张。这不仅在中日关系史上是一大突破，在中国处理与南海争端国关系中也成为一个具有现实指导意义的典范。

4. 以史为鉴

^① 《在亚非会议全体会议上的补充发言》，1954年4月1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文选》，第121页。

^② 张香山：《中日复交谈判回顾》，《日本学刊》1998年第1期，第47页。

^③ 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1971—1995）》，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249页。

中国领导人对待中日间历史问题的一贯态度是以史为鉴，面向未来。面向未来的前提是坦率承认日本对中国进行侵略的历史，并进行深刻的反省。1972年9月25日，田中角荣在周恩来举行的欢迎宴会上致辞，谈到过去日本侵华战争时轻描淡写地用“添了麻烦”的话表示道歉。周恩来在翌日举行的第二次首脑会谈中一口气讲了近一个小时，详尽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长达14年的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民族灾难。死伤3000万人，经济损失2000亿美元，绝不能用“添了麻烦”这句话搪塞过去。毛泽东在会见田中一行时也表示：只说句“添了麻烦，年轻人不满意。在中国，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裙子上说的话”。由于中方在原则问题上毫不妥协，最终在《中日联合声明》上明确写上了：“日本国深感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这是战后日本在与外国签署的官方文件中首次这样表述。

邓小平是中国领导人中最重视中日经济合作的，在历史问题上对日本的“敲打”也最多。1985年10月11日，他在会见日本外务大臣安倍晋太郎时强调：“这些年我们没有给日本出过难题，而日本的教科书问题、参拜靖国神社问题，还有蒋介石遗德显彰会问题，是给我们出了很大的难题。……因为这些问题一出现，人民就联系到历史。”^①一年后的1986年8月5日，邓小平会见日本自民党最高顾问二阶堂进，在谈到中日关系时，邓小平指出：“我们注意到日本政界有些人很强调日本人的感情，请他们注意不要忘记还有个中国人民的感情。……维护和发展中日关系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正确对待历史也是对日本人民进行教育的一种形式。”^②

进入新世纪后，中国的领导人始终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是发展中日关系的前提，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动摇和含糊。2014年11月，习近平在应约与日本首相安倍会面时严正指出：历史问题事关13亿多中国人民感情，关系到本地区和平、稳定、发展大局，日本只有信守中日双边政治文件和“村山谈话”等历届政府做出的承诺，才能同亚洲邻国发展面向未来的友好关系。^③2015年，习近平主席在雅加达应约会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再次严肃指

① 《邓小平会见安倍晋太郎时的谈话》，1985年10月11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087页。

② 《邓小平会见二阶堂进时的谈话》，1986年8月5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128、1129页。

③ 杜尚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会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新华社北京2018年11月10日电。

出：“历史问题是事关中日关系政治基础的重大原则问题，希望日方认真对待亚洲邻国的关切，对外发出正视历史的积极信息。”^①

（二）新时代中国对日外交的创新思维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中国外交迈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中国提出了构筑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在处理对外关系时由被动应对外部挑战转为主动形塑国际秩序，表现得更有自信，更有战略视野。在对日外交上也有一些不同以往的创新思维。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 坚持原则立场，捍卫战后秩序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对日本当权者的挑衅行为显示出前所未有的强硬立场。2013年3月23日，习近平担任国家主席后选择俄罗斯作为首次出访的国家。他在与普京总统会谈时强调中俄两国要“密切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配合，坚决维护两国共同战略安全，坚决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及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维护二战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从此，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成为包括对日外交在内中国对外交往中使用频率最高的主题词之一。2014年1月7日，《人民日报》就安倍参拜靖国神社发表署名文章指出：“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悍然参拜靖国神社，实质上就是要颠覆东京审判结果，美化日本军国主义对外侵略和殖民统治历史，是对人类良知的肆意践踏和对公理正义的狂妄挑衅，否定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成果，挑战二战后的国际秩序。”^②

中方对原则立场的坚持还体现在两大国家举措上：其一是设立南京大屠杀死难同胞国家公祭日。这是2014年2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一致通过的。同年12月13日，习近平主席出席首届南京大屠杀死难同胞国家公祭仪式并发表讲话。其二是举行“九三”大阅兵。2015年9月3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集会。习近平主席发表讲话并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部队。49位外国领导人和政府代表、10位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这次阅兵突出体现了世界各国人民反对战争、坚决维护二战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共同愿望。

^① 《习近平在雅加达会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2015年4月22日，中国新闻网，<http://www.chinanews.com/gn/2015/04-22/7226822.shtml>，访问时间：2019年1月25日。

^② 钟声：《对良知和公理的公然挑战——二论安倍晋三参拜靖国神社的恶劣性质》，《人民日报》2014年1月7日。

2. 审慎拿捏分寸，适当留有余地

面对中日关系复杂严峻的局面，中方秉持“斗而不破”的方针，在彰显原则立场、狠挫日方嚣张气焰后注意见好就收，给对方留面子，让其有台阶可下。这种收放自如、宽严相济的姿态，凸显了中方在处理涉日问题时的自信和大度，更有利于引领舆论，争取人心。

以2016年日本外相岸田文雄来访为例，4月30日王毅外长和他见面时慷慨陈词，毫不留情，强调日方应切实把中日“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的共识落实到具体行动当中，以积极和健康的心态看待中国的发展，不再散布或附和形形色色的“中国威胁论”和“中国经济衰退论”。^①《每日新闻》等日本媒体评论王毅外长此番话，说中方“采用了以往所没有的具体表述”，“公开表达了对安倍政府的不信任和焦虑情绪”。^②但是，中方随后由杨洁篪国务委员和李克强总理分别对岸田予以接见。对岸田这位自民党内第四大派系的领袖而言，这种高规格的接待无疑是能增加其政治资本的。既表达了中方对改善双边关系的诚意，也让岸田和他的支持者感到心悦诚服。

2016年9月5日，习近平主席在杭州举行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期间，应约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会面。习近平明确指出，中方致力于改善发展中日关系的基本立场没有改变。两国关系现在正处于爬坡过坎、不进则退的关键阶段，双方应该增强责任感和危机意识，努力扩大两国关系积极面，抑制消极面，确保两国关系稳定改善。要把握2017年中日邦交正常化45周年、2018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署40周年等重要契机，推动中日关系向前发展。^③2017年5月，安倍首相派遣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率团出席在北京举行的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并将亲笔信转交习近平主席，表示了希望与中方改善关系的愿望。随后，安倍在多种场合表示日本将在一定程度上参加“一带一路”建设。

① 《王毅会见日本外相就改善中日关系提出四点要求》，新浪网，2016年4月30日，<http://news.sina.com.cn/c/nd/2016-04-30/doc-ifxrtzte9842057.shtml>。

② 《日中外相会谈 關係改善に努力「南シナ海」は平行線》，《日本经济新闻》2016年5月1日。

③ 《习近平会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人民网，2016年9月5日，<http://cpc.people.com.cn/n1/2016/0905/c64094-28692950.html>。

3. 重视首脑互动，密切战略沟通

首脑互动向来是引领双边关系的“风向标”。但过去往往中日两国关系一紧张，双方首脑会晤便被取消。这固然是向对方施加压力的一种手段，但同时也失去了面对面沟通的渠道。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与日本差不多每年都有高层接触。即便日本高调介入南海局势，中日关系发展的势头暂时受挫时，两国仍通过首脑会晤进行战略沟通，中方将自己的战略底线清晰地告诉对方，同时也给对方台阶下。

自2014年11月至2018年底，习近平主席在国际会议的场合八次应约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举行会晤。分别是：2014年11月9日在北京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晤、2015年4月22日在印尼雅加达举行的纪念万隆会议60周年大会、2015年11月21日在秘鲁利马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2016年9月5日在中国杭州举行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2017年7月8日在德国汉堡举行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2017年11月11日在越南岘港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2018年9月12日在俄罗斯符拉迪沃斯托克举行的第四次东方经济论坛、2018年11月30日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

除了这八次会晤外，2018年5月8日习近平主席与安倍首相举行了电话会谈，这是中日两国领导人间的首次尝试。2018年10月26日，习近平在北京会见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的安倍晋三，这是日本首相在时隔7年后首次访华。与国际会议场合的首脑会晤相比，这样的战略沟通时间更充裕，议题更集中，磋商更深入，效果也更明显。

中国领导人在首脑会晤中一再敦促日方坚持中日间四个政治文件和已达成的各项共识。就战略沟通而言，应该说是卓有成效的。譬如，2018年10月26日，习近平在会见安倍时强调，当前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重现积极势头，值得双方共同珍惜。在新形势下中日两国要开展更加深入的战略沟通，开展更高层次的务实合作，开展更加广泛的人文交流，开展更加积极的安全互动，更加紧密的国际合作，要重信守诺，按照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和双方已达成共识行事，建设性地处理矛盾分歧，维护好中日关系健康发展的政治基础。^①

^① 李忠发：《习近平会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新华社北京2018年10月26日电，见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18-10/26/c_1123620183.htm。

4. 倡导合作共赢，推动第三方合作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站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洞察人类前途命运和时代发展趋势，提出了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倡议。中国通过各种双边、多边外交的舞台主动发声，在对日外交中充分体现了这一新姿态。

2013年，当中国刚刚提出“一带一路”构想时，日本是世界主要大国中反应最消极、质疑最强烈的。日本国内占主流地位的研判是，“一带一路”不过是中国企图改变地缘政治格局，与美、日争夺东亚地区主导权的战略工具。但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在国际社会受到广泛欢迎，日方态度发生了转折性的改变，由抵触、观望，转为有条件地参与。应该说，这是在中国对日外交创新思维指导下取得的成果。

2017年5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来华出席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日本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时明确指出，作为世界主要经济体，中日两国在推进经济全球化、推进贸易自由化等方面有着共同利益。“一带一路”倡议可以成为中日两国实现互利合作、共同发展的新平台和“试验田”。^①习近平主席这番表态得到了安倍晋三首相的响应。安倍在东京都举行的国际会议上发表演讲就“一带一路”倡议首次表态，表示日本将在条件成熟时与中国进行合作。^②

经过中日磋商，两国在“一带一路”框架下进行的国际产能合作使用“第三方市场合作”的称谓。2018年5月，李克强总理访日期间，两国就“第三方市场合作”签署合作备忘录。同年10月26日，在安倍访华期间，中日两国在北京举行了首届“第三方市场合作”官民论坛。双方政府部门、经济团体和企业界人士1000余人与会。期间，双方共签署了52项协议或备忘录，总金额达180亿美元。通过这些领域的合作，不仅两国能实现互利共赢，还能带动相关国家的发展。

^① 白洁：《习近平会见日本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新华社北京2017年5月16日电，见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7-05/16/c_1120980107.htm。

^② 《安倍晋三：一带一路若条件成熟日方愿合作》，凤凰网，http://news.ifeng.com/a/20170606/51199058_0.shtml，访问时间：2018年3月9日。

三、中日关系存在的问题与未来走向

(一) 中日关系的改善任重而道远

与中国与其他周边国家的关系相比，中日关系的改善难度较大。历史遗留问题和现实利益对立交织在一起，又掺杂着彼此间的认知差距，加上外部势力作祟，导致两国间总是磕磕碰碰，风波不断。

1. 中日间存在着旷日持久的结构性矛盾

中日间结构性矛盾主要是历史认识问题、台湾问题和领土争端这三项。

历史认识问题：日本对自己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侵略历史的反省上一直暧昧、含糊，未能让它的亚洲邻国尤其是中国人民满意。日本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身居高职的政治家发表美化侵略战争，否定战争责任的挑衅性言论。20世纪80—90年代，“失言”的阁僚常会丢官；但进入21世纪后，同样的“失言”阁僚却不必承担政治责任了。用日本媒体的话来说，日本的政治家中已出现了“谢罪疲劳症”。

靖国神社供奉着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不仅成为日本国内政争的焦点，也成为国际社会共同瞩目的议题。中国坚决反对日本现职首相参拜靖国神社，认为这是对中国等战争受害国人民的侮辱，是践踏人类良知和国际正义的暴举。进入21世纪后，中日两国在这一问题上的角逐加剧。从2001年起，时任首相的小泉纯一郎在5年内6次参拜靖国神社，致使中日关系急剧恶化。安倍晋三在第一任内慑于国内外的强烈反对，未敢参拜靖国神社，但他复出一年后却公然参拜靖国神社，这对已经跌入低谷的中日关系不啻是雪上加霜。2014年以后，安倍虽然再也没有敢踏进靖国神社大门，但他在春秋两季靖国神社大祭时依然用首相名义献祭品。未来，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将始终是一枚随时可以引爆中日对立的“定时炸弹”。

台湾问题：台湾问题是中日关系中最敏感的问题。日本在甲午战争后对台湾实行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殖民统治，目前仍然是与台湾在经济、文化领域联系最密切的国家。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交涉中，双方围绕台湾问题曾进行过激烈的交锋。在《中日联合声明》中，日本政府对中方有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立场表示“理解与尊重”，并坚持波兹坦公告第八条的要求。承诺只同台湾保持民间的、经贸领域的往来。但是，日本国内始终有一股政治势力图谋突破这一框架，提升与台湾的实质关系，导致中日间风波

迭起。

进入21世纪后，台湾问题日益成为中日战略博弈的重要领域。日本当权者采取“切香肠”的方式，逐步摆脱1972年后日台关系的基本框架。日本先是取消政府课长级官员访台的限制，继而又批准台湾卸任领导人赴日活动，将1974年成立的处理日台事务的“交流协会”名称改为“日本台湾交流协会”。更有甚者，2017年3月，日总务副大臣赤间二郎赴台参加公务活动。这是1972年日台断绝所谓“外交”关系以来访台级别最高的日本官员。与此同时，日台间军事互动也逐渐浮出水面。如日本自卫队将领以“退休”身份常驻台北，台“陆军总司令”赴日观摩自卫队的军事演习，等等。台湾当局推行“潜艇国造”计划，最青睐的是日本曾向澳大利亚推销的“苍龙”级潜艇技术。未来，三菱重工、川崎重工等制造商会不会让相关技术人员以“退休”身份赴台传授潜艇制造技术，将是中日博弈的一大“聚焦点”。

领土争端：中日间围绕钓鱼岛主权归属的争端是导致两国战略信任严重受损的直接“导火线”。1972年9月，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时，两国领导人曾经决定将这个问题“放一放，以后再解决”。1978年10月，邓小平在访日时再次强调“这样的问题放一下不要紧”。但是，从1995年起，日本政府突然“变脸”。先是否认中日间曾有过搁置钓鱼岛争端的默契，继而又纵容右翼团体出面在争端岛屿上兴建灯塔，以凸显日本对钓鱼岛及其周围海域的所谓“主权”。2010年和2012年相继发生的钓鱼岛撞船事件、钓鱼岛“购岛”闹剧，严重激化了两国间围绕岛屿主权归属的对立。

尽管中日两国在2018年6月启动了防务部门海空联络机制，对可能导致双方兵戎相见的对立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管控，但这毕竟不是最终的解决。从二战结束后的历史来看，世界主要大国间鲜有通过谈判解决彼此领土和海洋争端的先例。中日两国间围绕岛屿归属和专属经济区划分的争端还将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

2. 日美同盟是横亘在中日间的最大障碍

日本是美国在亚太地区最大的盟国。1952年，两国缔结《日美安保条约》。根据该条约，美国在结束对日占领后仍驻军日本，日本向美国提供维持基地所必需的土地和劳务。《日美安保条约》的缔结意味着日本加入了西方遏制中、苏等社会主义国家的阵营。

日美强化军事同盟导致中日难以建立战略互信。《日美安保条约》从诞生起就有浓厚的针对中、苏两国的军事色彩。虽然中日两国在1972年实现了邦

交正常化，中美两国也在1979年正式建交，冷战本身也已在20世纪90年代初画上了句号，但《日美安保条约》却不仅没有成为历史，反而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这一方面是因为美国需要依仗其盟国体系维护在亚太地区的霸权地位；另一方面日本也有拉住美国，扩大在亚太地区影响力的考虑。日美两国在1996年发表有关亚太安全的联合宣言，1997年和2015年两次修订《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日本还在1992年通过了《联合国维护和平法》，1999年通过《周边事态法》，2003年通过“有事法制”，2015年通过新安保法制，导致日美同盟联合对地区冲突进行军事干预的功能日益凸显。一旦台海地区爆发军事冲突，日美就会以日本安全受到威胁为由联手进行介入，阻碍中国统一大业的实现。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将对日本强化日美同盟的举措特别是对军事介入台海局势的动向始终保持高度警惕，这是两国间建立战略互信的最大障碍。

中日关系发展很大程度上受美国影响。中日关系走向总是受到美国的掣肘和左右。一般来说，中美关系发展平稳时，中日关系改善的空间就比较大，而中美关系一旦交恶，日本就较难与中国维持良好关系，甚至可能大幅后退。迹象表明，美国当权者越来越将中国视为挑战其霸权地位的主要竞争者。特朗普上任后，美国的遏华攻势有愈演愈烈之势。从长远趋势来看，中美关系已很难回到过去的状态。美国既然将中国视为主要竞争对手，必然会对日本百般施压，迫使其“选边站”。未来，日本不管是谁掌权，要想将对美“一边倒”转变为“两面下注”，阻力都是比较大的。

3. 日本的对华认知阻碍中日关系发展

王毅外长在2016年两会期间会见记者时强调，“治病要断根”。中日关系的病根就在于日本当权者的对华认知出了问题。面对中国的发展，究竟是把中国当作朋友还是敌人？当作伙伴还是对手？日方应该认真想好这个问题，想透这个问题。^①

从深层次看，日本之所以会在对华认知上出现上述问题，是日本媒体长期对华负面报道的结果，也是两国在变化了的国际国内环境下相互重新定位和调整关系过程中的必然现象。

日本大众传媒长期对华负面报道造成严重后果。近年来，日本媒体对华报道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热衷各种负面新闻的报道。这种负面报道长期发酵的结

^① 《王毅：中日关系病根在日本当权者的对华认知出了问题》，新华社北京2016年3月8日电。见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6lh/2016-03/08/c_128782862.htm。

果，导致日本社会对华认识严重偏离客观现实。近年来，日本主流社会对中国的评价是：政治上实行“一党独裁”，高层权力斗争不断；军事上已形成对周边国家的威胁，试图以实力改变现状；经济上则是“濒临崩溃”，拖累了世界经济。据美国皮尤研究中心2015年对40个国家的调研，82%的巴基斯坦受访者对中国有好感，俄罗斯对中国持肯定态度的比例是79%，韩国是61%，美国38%，德国34%，而日本受访者对中国的好感度仅为9%，低得离谱。^① 这种状况恐怕在短期内难以发生根本变化。

中日国力逆转造成日本国内对华焦虑感日益凸显。一般而言，在两个国际行为体之间原有的平衡状态被打破时，彼此间最容易产生疑虑和不安，弱势一方总是较强势一方更强烈。1990年，日本的GDP总额相当于当年中国的9倍多。日本朝野普遍存在着一种思维定式，认为中国永远不可能赶上日本，也威胁不了日本，对来自中国的批评多少还比较宽容。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两国GDP总额的差距逐步缩小、持平，2010年中国的GDP反超日本，2017年更达日本的2.5倍。日本对中国的迅速追赶既不适应，也不服气，朝野上下普遍存在着对华焦虑感、恐惧感。2018年10月，日本民间非营利组织“言论NPO”和中国外文局共同举行的民意调查表明，日本受访者里对中国印象“很好”和“较好”的比例较上年只增加了1.6个百分点，与中国受访者对日本印象改善10.7个百分点，两者形成鲜明对比。^②

（二）从战略高度把握和引领中日关系

为实现两个百年目标，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需要有稳定的周边环境，有一批友好相处、互利合作的邻邦。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亟须保持中日关系企稳向好势头，推动中日关系的真正转圜。这是中国经略周边环境，改善战略姿态的关键“棋局”。有以下五大着力点。

1. 坚持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

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的历史表明，只要两国忠实履行四个政治文件，双边关系就能稳定和前进，反之则会出现曲折和倒退。正如习近平主席2017年7月

^① 美国皮尤调查中心2016年6月29日发表，转引自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中国力量”（China Power）项目研究报告《世界对中国看法的变化趋势》（How are Global Views China Trending ?），<http://chinapower.csis.org/global-views/#1466797926875-8b9b1371-534e>。

^② [日]特定非营利法人言论NPO：《第14回日中共同世論調査》，2018年10月9日，见言论NPO网站：<http://www.genron-npo.net/world/archives/7053>。

8日在汉堡会见安倍晋三首相时所指出的，在涉及中日关系政治基础的重大问题上“不能打任何折扣，更不能有一丝倒退”。^①2018年10月26日，习主席在会见安倍首相时再次强调，要重信守约，按照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和双方已达成共识行事，建设性地处理矛盾分歧，维护好中日关系健康发展的政治基础。^②这是确保中日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的“定海神针”，也是我必须牢牢占据的道德高地。

2. 高举维护自由贸易的旗帜

中日两国都是现行国际秩序的最大受益者，也应该是自由贸易和多边体制的捍卫者。慑于美国的压力，日本当权者目前尚不敢公开向特朗普政权的倒行逆施叫板。但随着美国迫使日本让利的要价不断提高，超出一定的容忍底线，日本也会为维护自身利益与美国顽强交涉。如果欧盟和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一起抵制美国的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日本的态度可能还会更强硬一些。中方宜对日本晓以利害，善加引导，敦促日本切实兑现维护自由贸易和多边机制的承诺，为早日缔结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共同发力，并尽快完成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FTA）谈判。

3. 深化两国经贸领域互利合作

发展经贸领域的交往一向是中日关系的“压舱石”。两国应加强在节能环保、金融保险、医疗介护等领域的互动，扩大双方产业链、价值链和供应链的高度契合。要落实两国在第三方市场合作官民论坛上缔结的一系列协定，在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互联互通和产能领域的合作中，共绘宏图，共担风险，共享利益，实现“三赢”或“多赢”。目前，以“日本运通”为代表的日本物流企业已深度参与“中欧班列”的运营，通过“海陆联运”“空陆联运”架起沟通亚欧两大经济圈的“桥梁”。这是一个可喜的开端。

4. 努力克服安保合作的“短板”

中日两国在安全保障领域分歧突出，信任缺失，是两国民众对对方国家亲近感低位徘徊的主要原因。为克服这一“短板”，首先，要恰当管控分歧，防止偶发冲突。两国已启动防务部门海空联络机制。下一步可考虑签署“重大军事行动相互通报信任措施机制谅解备忘录”和“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谅解备

^①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8日应约在汉堡会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中国新闻社汉堡2017年7月8日电。

^② 李忠发：《习近平会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新华社北京2018年10月26日电，见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18-10/26/c_1123620183.htm。

忘录”，逐步完善危机管控机制。其次，要加强安保对话，避免战略误判。宜在自卫队和解放军间恢复校官级互访基础上，适时重启舰队互访和防长互访。再就是推动两国在打击海盗、跨国救灾等非战争军事行动中的合作，逐步增加彼此间的互信。

5. 促进两国民间交流人文合作

鉴于两国民众对对方国家的亲近感都比较低，宜大力推动两国传媒界的交流合作，力求客观、准确地传递对方国家的有关信息。目前，两国国民访问对方国家的数量出现明显的不平衡，访华的日本游客仅及访日中国游客的三分之一，由此也带来了彼此对对方国家亲近感的“温度差”。要切实落实两国政府有关5年内组织3万名青少年访问对方国家的安排。特别要创造条件，尽快恢复日本中小学生对以中国为目的地的修学旅行。两国还需着眼未来，推进民间交流队伍的“新陈代谢”和“世代更替”，推进民间交流平台的网络化和社交媒体化。

A Review of 70 Years of China's Diplomacy toward Japan

WU Jinan

Abstract As one of China's neighboring countries that is separated from China only by a stripe of water of the East China Sea, Japan is the largest developed country of the Asia and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countries in China's neighboring areas. In China's diplomacy with its neighboring countries, its relation with Japan has always been put on the list of top priorities. In 1972, China and Japan normalized their diplomatic relations, opening a new page on the history of their bilateral relations. In the past 47 years, the mutual exchanges between these two countries have surpassed any single period in history, whether in depth or in scope. Both of two countries have obtained substantial benefits from their peaceful coexistence and equal cooperation. However, in pace with the changes of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and the shift of relative overall national capacities of these two countries, ups and downs occur in this bilateral relations and twists and turns are inevitably emerging. Therefore, one of the most thorny and important tasks confronting China is how to ensure a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China-Japan relations along a stable track through locating common interests and avoiding unnecessary harms, and through a joint effort to follow the trends of the world.

Key Words China; China's Diplomacy toward Japan; 70 Years

Author Wu Jinan, President of Shanghai Association for Japanese Studies, Professor and Vice Director at Advisory Committee, Shanghai Institutes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SIIS).